



1975年5月12—17日，邓小平应邀对法国进行友好访问。这是自1964年中法建交以来，中国国家领导人第一次对法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。

起点。连孟戴斯-弗朗斯本人都说，“我深感法国不承认事实上存在的新中国是不现实的”。正当他寻求中法建交时，哪知道他也倒台了。

直到戴高乐得以复出，并稳稳地掌控局势以后，才有了富尔来华接洽建交之事。但富尔之所以秘密前行，不仅因为要在国际上掩人耳目，也需要防止法国国内一些人捣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向中方强调戴高乐乃至法兰西的面子，确实有他认为很重要的原因。

最终，中方以《周恩来总理谈话要点》的形式，向富尔提供了中法建交的方案，内容主要是三点：其一，法国政府向中国政府提出正式照会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，并建议立即建交，互换大使。其二，中国政府复照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，欢迎法国政府的来照，愿立即建立外交关系，互换大使。其三，双方同时发表上述照会，立即建馆，互派大使。

中法建交，箭在弦上。富尔由缅甸回程期间，表面游山玩水掩人耳目，实则迅速向国内通报了访华情况。1963年12月中旬至1964年1月上旬，中法两国在瑞士等地确定了建交过程的细节。

1964年1月27日，中、法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公报，决定建立外交关系。

对此局面，台湾当局还想挣扎，其指责戴高乐的政策是“分期投降”。而戴高乐则向时任法国总理蓬皮杜面授机宜。最终，在中国驻法临时代办宋之光与法国方面的双重施压下，台湾当局所谓的“外交官”被“劝退”。

跨越山海让世界更美好

中法建交，世界瞩目，更令美国感到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《纽约时报》一篇评论感慨道：“我们同法国的关系犹如又甜又酸的杂拌。”亦有评论认为，中法建交犹如“在密不透风的铁板上撕开了裂缝”。多年以后，有媒体回顾中法建交时美国的状态，如此写道：“美国的反应则如同青春期少年的家长：既对其日益壮大的独立意识心怀不满，又因为不想破坏‘家庭团结’而无法公然阻止和干涉。”

无法公然阻止，就暗地里使绊子。美国情报人员当时在巴黎搞了不少事。比如，由于蒋介石集团不肯放弃位于巴黎乔治五世大街的馆舍，且派专人把守，我方先遣队决定另找地方，用于临时办公。当时看中巴黎西北郊诺伊居住区内一栋花园洋房。房主本是一位意大利军火商。其因负债自杀，债务和房子都由其美籍遗孀继承。当中方掏了110万美元买下房子后，美国情报人员上门威胁女房主。一时没主意的女房主吓得痛哭流涕，几度欲毁约。最终，在宋之光的劝说下才如约交房。

1967年，在戴高乐的亲自过问下，巴黎地方警察前往乔治五世大街11号，将躺在地上不肯走的台湾当局留守人员强行抬走。五星红旗终于在此升起。

年近八旬的戴高乐有一个夙愿，就是访华。可非常遗憾，在他跨出这一步之前，1969年4月，法国国内政局又发生变化。戴高乐不得不辞去总统职务。然而，戴高乐前往中国的意愿却更为强烈。他多次公开表示，自己回忆录的终章将是“与毛泽东见面”。不多久，中方了解到戴高乐的意愿。1970年秋，周恩来向戴高乐发出诚挚的邀请。戴高乐计划于1971年6月18日访问中国。然而，非常遗憾的是，1970年11月9日，戴高乐突然因为动脉瘤引起胃动脉破裂而去世。

未能访问中国，成为戴高乐永远的遗憾，也成为中法人民的共同遗憾。如今回望历史的话——1971年7月9日，基辛格取道巴基斯坦秘密访华。美国人的许多做法与1963年戴高乐指示富尔所为一模一样。而假若戴高乐能于1971年实现访华，或许会与基辛格处于东方大国的同一座城市。

戴高乐的继任者是其担任总统时的法国总理蓬皮杜。在外交路线上，蓬皮杜与戴高乐一脉相承，且与中国有不少共识——不赞成美苏“共管世界”，都希望维护自己国家的独立自主，反对外国干涉本国内政。担任法国总统后，蓬皮杜于1970年7